

一九七九年來中國基督教會的國際關係

穆藹仁著

林瑞琪譯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基督教會

中國基督教會的領袖宣稱他們現正處於殖民地後及宗派後時代，意思是這個昔日的「宣教時期的教會」，現今已完全獨立自主了。雖然與國外的教會及差會完全斷絕關係達三十年之久，中國基督教會仍能克服文化大革命的十三年壓迫，在沒有宣教士服務的情況下，以完全自養、自治、自傳的方式於一九七九年重新出現。今日在中國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宗派後基督教會，而獨立自主始終是他們與世上其他姊妹教會及普世教會的合一機構建立關係時採取的主要原則。

爲了明白目前發展的意義，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基督教會雜亂紛陳、宗派割據及對外國傳教機構的依賴程度。當時在中國只有由本地人士組成的團體，才可能成爲真正的獨立自養的教會，他們包括小群、真耶穌教會、及耶穌家庭等。這是本世紀初期由擁有神恩的華人領袖所帶動的發展，直至一九四九年爲止，他們已佔中國基督教徒總數的四份之一。

其餘的基督教徒分屬不同的宗派，全部與其祖家差會關連。在二十及三十年代，任何單一的宗派，

諸如信義宗，可能有多達十餘個互不相屬的地區教會，每一個都與其在北美或歐洲祖家的差會有直接關係。一九二六年，在中國有超過一百二十個基督教外國差會，宣教士共達八千三百二十五人。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籍神職人員有二千零二十四人，而宣教士尚有四千零九十一位，其中九百三十四人已領受聖職。

暫且撇開本地宗派不論，教會及宣教團體可分為三大類：主流宗派（諸如循道衛理會、長老會、信義宗、聖公會等等）；較小型的福音教派（例如：神召會）；以及獨立而不屬於任何宗派的差會（諸如協同會及內地會等等）。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的，清一色是主流宗派，甚至也並非所有主流宗派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四年後，由十六個差會組成了一個教會聯合會，稱為中華基督教會，佔當時全中國基督徒總數的三份之一。這些宣教會全屬於加爾文改革宗，如長老會、浸信會等。雖然中華基督教會以華籍領

導人為主，但與其他宗派教會一樣，宣教士的工作及海外財政資助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遍佈中國的基督宗教宗派及小教派的國際關係，基本上是雙向的，與他們在歐美的母會保持獨特的關係，並藉此界定本身的身份及獲取宣教事工上的支援。

當時也有一些海外的普世教會合一接觸，特別是透過一些國際性的基督教組織，諸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及聯合聖經公會等等。一些中國宗派的代表也有出席一九四八年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在會議上，著名的中國神學家趙紫宸博士更當選為主席團六位成員之一。趙博士於三年後辭職，象徵著中國基督教會有意撤出所有國際性合一組織，這項政策一直維持至今。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基督教會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這一切都起了變化。韓戰（1950—1953）爆發，標誌著宣教士時代的結

束；一九五零年起，所有海外財政資助均告斷絕；到一九五二年底爲止，除了少數被囚或被軟禁外，絕大部份宣教士均被驅逐出境。中國籍的教會領袖甚少出國，而在一九八零年以前，也絕少有外國基督徒可以訪問中國。出乎大部份人士意料之外的是，中國教會並沒有從此萎靡或消失。相反，在沒有海外協助的情況下，教徒數目反而倍增。一九八八年底爲止中國基督教徒的人數，較一九四九年的九十三萬六千，增長超過五倍。（註一）

中國教會已經發展到完全自給自足。所有教會醫院、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過往主要倚賴海外的資助，現在都悉數轉移給國家。類似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均中斷其在國際層面上的會籍。教會亦不再依賴進口的神學書籍及聖經。

三自是展開國際關係的基本政策

中國基督教協會主席丁光訓主教在一九八零年所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督徒致海外基督徒的十

四點」一文中，第五點談到基本的三自原則（註二）：

（五）我們的三自原則

我們堅持中國教會實行三自愛國，堅持自治、自養、自傳是合理的，正義的。從過去歷史來說，中國教會必須走三自愛國的道路，必須自治、自養、自傳。今天，中國教會要在人民中間做見證、傳福音，也一定要自治、自養、自傳，不能重新回到「洋教」的老路上去……。

這些政策對教會的國際關係產生甚麼影響呢？

同一篇文章中的第十一至十三點談到這個問題：

（十一）中國基督教的國際交往問題。

中國教會是一個很小的教會，但任務很重，我們的主要精力一定要放在國內。我們願意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推進我們的這個實驗。那麼，也許在將來可以談得上對國際基督教的貢獻。因此，國際交往只能是少量的，我們必須是有選擇的，我們必須（在友好與敵對間）區別對

待。

(十二) 參加國際活動和國際會議問題。

我們既要區別對待，又因精力有限，必須有所選擇。有不少對我友好的會議我們不能前去參加，海外不少友好教會團體我們不能都邀請來訪，我們要請海外朋友諒解。

(十三) 海外教會團體和個人的捐贈問題。

我們中國教會已經自養，已經獨立自主，今後我們可以不抱「關門主義」。我們中國教會是一個很小的教會，我們的經濟力量也很小，但我們自己能夠供養自己。我們的堅強在於我們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這樣，我們經濟上就不寄生於人。但是，為了體現基督教的國際團契，我們正在研究，可否在不影響我國教會獨立自主的情況下，稍微接受外國教會對我友好的個人和團體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贈？必須是對新中國、對中國教會友好的，並且必須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

丁光訓主教及其他中國教會領袖在其他言論中亦一再重申三自政策。中國基督教協會的秘書長韓

文藻，於一九八一年在加拿大滿地可的國際性合一會議上發表演說，談及「國際交往問題」時，也引述了一九八零年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的議決

(註三)：

中國教會在堅持三自愛國道路的同時，願同國外的教會與信徒，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下，進行平等友好的交往，促進主內團契。但是對於國外少數人堅持敵視新中國，漠視我國教會主權，漠視我們的三自愛國原則立場，妄圖分裂中國教會，以「傳福音」為名，進行各種反華和滲透活動，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各國許多信徒也是反對的。這些人的圖謀注定要失敗。

韓文藻先生又說：

這就是我們在國際交往方面的基本看法——區別對待……。過去一年中，我們也曾多次聽到過這樣的提問：中國教會為甚麼不願意接受海外

教會的幫助，使福音儘快地廣傳，而採取了一項近乎關門的方針？我願意誠懇地告訴他們，我們的方針并非關門方針。近幾年來，我們同海外教會有來往，有交通。有一些海外的教會和個人，他們對新中國抱有善意，尊重我三自原則立場與我教會主權。他們的善意與愛心使我們互享肢體間互愛互助的團契。我們歡迎同海外這樣的信徒交往，就連他們的某些物質捐贈我們也沒有全部關門嘛。不過，我想要說的是，中國教會的成長應該在上帝的引領下，主要靠廣大中國信徒的事奉……。

（最後，）請允許我重覆一句，雖然我們是一個小教會，雖然目前我們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國內重建教會的聖工上，我們是珍視同海外同工同道的友好來往的。

一九八六年南京會議

一九八六年以「合一分享：新的議程」為題的

國際性合一會議在南京舉行，丁光訓主教向來自二十二個國家的一百四十四位代表講話，在向各地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伸出友誼之手的同時，仍重申三自原則（註四）：

從三自運動最起初時開始，我們為自養所下的定義是：在同工的薪金、傳福音的工作、基督奧體的建立及滋養等各方面，是我們中國基督徒自己的責任，不可依賴海外傳教基金會的力量……。自養並不意味著要抗拒教會之間的資源分享，我們堅持以此作為原則，是因為我們認識到這是令到中國教會成為真正中國化的重要先決條件。只有在教會能夠確立自我之後，才可以對教會之間的交流作出真正的貢獻。

丁主教進一步解釋說，海外個別友好人士出於誠意、無私及愛心贈給中國教會的禮物，與中國基督徒送給自己的教會的奉獻一樣同受歡迎。同時，當發現海外的教會有需要時，中國基督徒在不損及當地教會自主性及完整性的前題下，應慷慨襄助。

丁光訓主教（一如很多其他到訪中國教會的人士），視中國教會的三自政策為「中國基督徒替普世中教會所作的試驗。假如能夠成功的話，肯定對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不會帶來損害，但卻能夠使他們有所裨益……」

因此，南京會議所討論得最熱烈的主題是：如何公正而均衡地把第一世界國家教會的資源，拿出來與發展中國家的教會共享。但由於中國教會奉行三自政策，這項主題為他們而言明顯是無關痛癢。

一九七九年以來的國際交往

雖然中國未有重新發展與海外基督教宗派之間的雙邊關係，（原因之一是在中國已再無宗派之分，）但自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大三中全會撤銷對宗教活動的限制後以來，中國基督徒代表團已訪問了多個國家。

他們首次外訪是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前赴美國參與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第三世界宗教和平會議。

由佛教人士、伊斯蘭教徒及基督徒所組成的中國宗教領袖十人代表團，出席了為期兩週的會議。其後，基督徒代表團又訪問了多個國家的教會。（事實上，天主教、伊斯蘭教及佛教人士，也造訪了自己的教胞。）

多個國家的代表團也回訪中國，以促進相互的友誼及了解。不過，除了愛德基金會及其他教會間接參與的計劃外，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教會與教會之間的正式合作計劃。

社會服務方面的國際資助

雖然沒有宣教士可以直接為中國教會服務，但愛德基金會仍能夠在一九八五年應中國教會領袖的邀請而成立，以便對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各方面作出貢獻。而很多來自西方教會的友好人士，亦透過愛德基金會幹事的安排，得以在中國多間大專院校授課。愛德基金會董事局的成員當中，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均有，是全由中國人組成的組織。它歡迎

海外人士在人力或財力上的捐助，以開拓諸如傷殘或弱智服務等工作。這是首次在大型項目上，外國基督教及機構獲邀請與中國基督徒合作。

自從一九八五年成立至今，愛德基金會的服務項目增長數以倍計，服務範圍廣及多個省份，具體地見證了中國及海外基督教會對社會現況的關懷。不過，該會的發言人卻一再澄清其獨立於基督教會以外的身份。

作為一個非政府及非教會的組織，愛德基金會象徵著基督徒參與中國社會的一種新形式。這項新形式最起碼有兩大特點：首先，發起成立愛德基金會的意念來自中國大陸，所有的服務項目是在經過與中國的專業人士商量後，按中國本地的需要及現況，而作出抉擇、設計、審查及評估的；其次，愛德基金會象徵著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合作，包括與共產黨人士的合作，共同努力為人民謀幸福。愛德基金會不分宗教，為中國人民的人道福利事業作出貢獻，

也促進基督徒參與中國社會方面的發展，並使之廣為中國及海外人士所知曉。

愛德印刷廠

愛德基金會是唯一不獨立於教會之外的項目，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許可，與聯合聖經公會（一個世界性的各國聖經公會聯合會）合作經營設於南京的愛德印刷廠。儘管這座極度先進的印刷廠主要是由聯合聖經公會所捐贈，但印刷廠亦承接外間非教會人士的印務。自從一九八七年底開幕以來，它的主要任務是為中國教會印刷中文聖經及基督教會出版物。該廠所印行的第二百萬本聖經，已於一九九零年八月印訖、釘裝並付運到地方上的聖經轉發中心。

結論

自從中國實行國際關係正常化以來，中國基督徒開始有機會接納海外友好的到訪，以及親自到海

外訪問。不過，一如其他中國公民，他們申請出國簽證時，也遇上不少條件限制。舉例說，有一批中國修生本來得到西方國家某神學院邀請，在下一個學年前往該地的神學研究院攻讀，但因為中國政府拒絕發出護照及出國簽證而不能成行。我們希望這只是一個短時期的緊縮政策，因為在過往數年間，有不少修生獲准到海外升學；很多其他學科的中國研究生也在今年內獲批准接受海外的獎學金。

總體來說，儘管存在一些限制，但中國基督徒透過中國基督教協會的領導人所作的努力，大體上與海外的友好保持了正常的關係。他們差不多完全没有接受教會與教會間的經濟資助，而是分享他們在推行三自治理教會的經驗，這也是中國基督徒貢獻給普世教會的經驗。

（附註見英文頁六十八。）

簡訊

江澤民會晤五大宗教團體領導人

今年一月卅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各宗教團體主要領導時說，要依法加強對宗教工作中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施行，目的是維護正常宗教活動，加強行政管理監管，防止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

北方教會領袖參與學習研討會

來自中國東北部及西北部七個省市的教會領袖，於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間，在北京市郊順義縣，出席學習研討會。六十一位出席者當中，包括二十六位主教、十五位神父、六位教友及十四位政府幹部及工作人員。共產黨統戰部副部長張聲作在會上強調四點：東歐近期發生的和平演變，絕不可能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的情況與東歐完全不同；中國教會必須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必須予以落實；必須尋求辦法教育地下教會人士，引導他們加入公開的教會。